

又一城隨想記

薛求理

購物商場(Shopping Mall)的概念大約源自美國。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處，鏟平樹林，建起大廣場，周邊一圈連廊商店，中間則是大大的停車場。後來，商店聯成有冷熱氣的二至三層大棚，外面則是泊車的汪洋大海。

購物商場的概念傳到地少人多的亞洲，不得不作調整。再也不能汪洋大海似地平地泊車，商場也總是建在交通樞紐處。

集市的變遷

早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，太古城便建起延至數百米、高四、五層的大商場，玻璃廊跨過一條又一條街，室內溜冰場逕對著海港和東區走廊。

同時期，沙田新城市廣場和金鐘太古廣場也告建成。從擁擠舊市區搬去新鎮的沙田居民，甫出九鐵車站，即捲入新城市廣場的滾滾人流，一個高大縱向的廣廳，串聯著多重橫向的側翼，四圍的層層平台共享著正中的音樂噴泉，沿著五光十色的商店，人們走到了家，走到了回家的汽車站，走到室外精緻的廣場和大會堂，走到公園和水邊。而金鐘的太古廣場則隨街之輪廓微微彎曲，室內裝飾材料華貴凝重，構築起高檔名店和樓上的星級酒店，配上中環或匆匆或矜持的白領和麗人，實在是很合適的。

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銅鑼灣時代廣場中庭高至九層；深水埗的西九龍中心更將溜冰場和過山車轟轟隆隆地搬入商場。

傳統的街道是線型的，人車爭道，廣場則是街道的交集點和緩衝。而中國傳統城鎮卻無供公眾消遣的廣場。香港的購物商場集街道、廣場和高層建築為一體。國外的左派知識分子和規劃家攻擊現代購物商場抹殺傳統，限制市民自由。但在炎炎夏日，價格又相同的情況下，大部分市民會願意到攤販遍

地的污濁窄街擠軌，還是到涼爽乾淨的闊大商場裏蹣跚呢？

又一城狂想曲

一九九八年聖誕前夕，太古公司籌劃建設十年的又一城在九龍塘開張。又一城建築面積約近十萬平方米，幾乎與馬路對面的城市大學大小相若。

又一城下層與九龍塘火車站平齊，地下層連地鐵，而中層則可從達之路出入，穿過隧道則到凹在山谷裏的城市大學，隧道之上是巴士總站。九龍塘本來就是地鐵火車唯一交匯處，又一城的建設加強了九龍塘的樞紐作用。商場旁邊，建造了數層辦公樓，惜乎籌劃在機場搬遷之前，否則可以提供更多辦公面積，紓緩每日從新界湧往港島的人潮。

又一城商場主要零售面積有六層，加上通往地鐵的百佳商場，則是七層。商場中庭上下相望，有的三層，有的六層之高。商場的平面，以中庭為主，像河流一樣流淌、彎曲，而匯入通高六層，天空前後皆鋪滿玻璃的高潮空間，陽光滿瀉，汽車展、時裝秀、音樂會、阿福哥、聖誕樹，湧來湧去的年輕人、學生仔，又一城總是充滿了節慶的氣氛。

以往的建築總是上下對齊、對位對稱，層層一樣，而又一城的層層平面卻似乎全無對齊關係，一條線直衝過來，一個面撞將過去，在中庭仰望或俯視，一層層平面毫無規律地錯開、突出、交叉、橫七八豎的自動扶梯搭接在洞開的樓層上，平台圍著透明玻璃扶手，扶梯裹著不銹鋼鏡面，上下的人流在鏡面裏扭曲變形。光怪陸離。

再看地面的人造花崗石鋪砌。傳統的富貴對稱圖案不見了。不同顏色的石材在偶然的斜線裏拼接衝撞。

這般偶然性的平面，不重複的平面，必然費工費料。多拜電腦的計算和精確，才能把這種異想天開，有點塗鴉式的構思變成建造起來的龐然大物——一個流動、動態而偶然凝固起來的龐然大物。

風格當隨時代

上世紀初，歐洲掀起現代主義建築思潮，現代主義崇尚簡潔、無裝飾、機器美學、「少就是多」——其背後是工業革命、科學理性、現代藝術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的普遍貧窮。

到了後工業時代的二十世紀末，解構主義(deconstruction)趕上了時髦。解構主義本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(Jacques Derrida)的見解，後來建築師與其合作，將解構概念搬到建築理論上來。理論歸理論，建築設計手法基本上還是一九三〇年代前蘇聯構成主義設計的延續，在構圖上玩弄一些錯位、脫位、扭轉等等手法。

如果要在香港體驗所謂「解構」，又一城恐怕算是沾上了點邊。又一城的建築設計競賽進行於一九九三年，在數項提案中，一家名叫Arquitectonica的公司中標，這是一家開在美國邁亞密的夫妻老婆店，男的是秘魯

人。他們在邁亞密以設計私人住宅起家，風格一向大刀闊斧，頗有南美豪放風格。

又一城不僅部分沾上了「解構」風，其內外處處躁動鼓凸，東衝西撞的體量更部分體現了「權威」建築理論家Charles Jencks所鼓吹的二十世紀末建築應有的複雜混沌非線性。

二十世紀末的世界圖景不再是線性成長、機械進化、蒸蒸日上，而是充滿矛盾、混濁、複雜、曖昧和隨機。建築風格當隨時代。

一九八八年，首屆解構主義建築研討會在紐約落幕。我與中國建築界的朋友們譯撰了「解構」這個中文名詞，發表在一九八九年北京的《世界建築》雜誌。鄙之萬言拙作經大幅修改後，於一九九〇年刊發於台灣《建築師》雜誌，這是海峽彼岸首次出現這一「主義」，該刊特以社評推介之。

文章結尾，我寫道，（解構）「當它真正契合着業主要求落到地上的時候，多數也許就不再成其為解構主義了。」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筆者依舊如此認為。

（原載《明報》2002年2月13日）

